

“孩子优先”应成全民理念

□ 李长虹

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牵动人心。对孩子来说,这是交通优先的一小步,也是校车安全的一大步。虽然这“优先”,是次次次惨痛事故倒逼出来的,但终于迎来的实实在在的制度赋权,既是对天堂里孩子们的告慰,也是对更多孩子和家长的宽慰与安全保障。

而对于转变社会观念来说,条例则跨出了让“孩子优先”的一大步。我们有刻骨铭心的记忆:17年前,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就有一句“让领导先走”,令孩子们错过了逃离火场的最佳时机;我们无比心疼地看

到,在一些地方,成年人的活动,还在用未成年人作道具;顶着烈日出席企业庆典,穿着单衣雨中夹道欢迎领导视察……虽然是极端少数现象,但也折射出,“孩子优先”的理念并未成为社会共识,也未获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里的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事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准则。而刚刚颁布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规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落实到与孩子相关的方方面面工作中,特别是落实到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例来说,“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

车种种“特权”;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说,“孩子优先”,是校舍的“安全防护”,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再让孩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留守儿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说,树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坚持“孩子优先”,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先”。希望“孩子优先”不要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据人民日报)

媒体声音

华西都市报

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元化

背景:12月8日,北京市地税局征收管理处处长陆坤表示,年终奖存在临界点问题。年终奖多发一千元钱,个人所得税可能就要多缴一千元钱,个人所得税可能就要多缴一千元钱,这种情况可能是税率级差造成的,但各单位财务人员先计算好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观点:年终奖“一元纠结”源于个税“一元化”。截至今日,个税改革锁定于免征额与税率之上,而且是“一道杠子”,缺乏灵活性。关于个税改革,有很多“金点子”。有关人士建议,建立个税自动调整法律机制,建立刚性和弹性兼具的个税法律机制,让个税起征点能够随着时代和人们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有人则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最合理,不但考虑到了公民个人的利益,更考虑到了公民家庭的整体福利;还有人提议,建立人性化机制。在个税征管方式上,发达国家早已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和人性化的制度。比如说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等等。下一步的个税改革应该破除“一元化”格局,踏上“多元化”征程。

新京报

“逃犯享受低保”是场黑色幽默

背景:据《法制晚报》报道,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一名在逃人员被警方网上通缉期间,居然通过低保复审,享受每月上千元的低保待遇。社区民警和案件受害人多次找到低保发放部门,要求撤销在逃人员的低保,却被告知要先抓到通缉人员才能撤销。无奈的受害人戏称,低保部门是“在逃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观点:尽管相关规定并没有明确把在逃犯等特殊人群排除在外,不过,其中所规定的审核程序,实质上已经把在逃犯排除掉了。按理说,一名四处躲藏的在逃犯,无论何人都无法通过审核程序,也不该享受到低保。然而,到了一些基层政府部门那里,竟神奇地让人把一种“不可能”变为“可能”,真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这仅仅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失误,还是我们的低保审核制度存在漏洞?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这些疑问谁来为我们作答?

千龙网

“三国杀”通缉令值得肯定

背景:12月8日,南京白下警方发布“三国杀”版通缉令,将逃犯姓名、头像、犯罪信息印在“三国杀”各类卡牌中,向网友征集线索并悬赏。警方负责人称“三国杀”版通缉令为全国首创。

观点:“三国杀”是目前国内一款非常流行,也非常时尚的桌面游戏,喜爱者众多,而警方把本来很严肃的通缉罪犯的工作,和网络游戏结合到了一起,推出了“三国杀”版的通缉令,这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让网友和公众中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如果警方制作的“三国杀”卡牌能够得到网友们的喜爱,争相通过微博、QQ等方式来转发,不但节省了警方的办案成本,也能提高这些被通缉者的“出逃率”,更好地帮助警方破案。说到底,警方的“三国杀”,体现了警方的工作智慧,是警方在工作手段上的一种创新,有益无害,值得尝试。

新华网

“符号防盗”究竟靠不靠谱

背景:近日,成都警方公布了17种小偷的“踩点符号”。×代表“计划行动”,◇代表“无人居住”,波浪线代表“小心恶狗”,长方形加斜杠线代表“已经偷过了”。警方提醒市民留意盗窃符号,发现符号立即报警并尽快清除。

观点:有人说,趁着“密码”可能还在保质期,赶紧画些个“已偷”符号在自家院墙上,平安过个无盗年。幽默的反弹民意,纠结的无非是防盗的“正道”与“左道”的问题。平心而论,公安部门也是一片善意,将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告知大众,提醒大家防患于未然,总强过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再说,建议居民看到可疑符号报警,也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增益社会的防盗意识,起码不是一件坏事。当然,“符号防盗”也只是职能责任的“甜点”,而不是“正餐”,只要理顺这层关系,舆论也没必要吹毛求疵。

头题评论

1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接送幼儿、小学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项优先权: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通行的路段行驶;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等。

深思一刻

专家数据为何与民众感受脱节

□ 许斌

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该院的张其成教授说,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在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应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张其成教授的预估是靠谱的。按世界银行标准,在2010年,中上等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是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在3976美元~12275美元之间,中国很可能达得到的。

GNI是很专业的一个经济词,指一个国家一年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总和。对于非专业人士,不妨就这样理解,以同期GDP(国内生产总值)为基数,减去被外国人直接拿走的那一部分,然后,加上中国人直接从国外拿回来的一部分,结果就是GNI。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在数字上,中国的GNI与GDP区别并不大。

但从网络留言上看得出来,网民根本不关心世界银行的具体标准,却本能地认为中国不能算是中上等收入国家。不能说网民们不讲道理,而只能说,因为社会分配不合理,所以网民认为世行的具体标准对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在国人的实际感受中,加班加点工作为生活常态,还望房兴叹,还苦于医疗成本、教育成本等等,这些都是分配不公平、社会没有与同步发展的具体表现。

所以,揆诸现实国情,与其谈那些大而化之的数据,实在不如具体谈一谈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以及他们的具体工作时间、生活水平,以及有病进不进正规医院,每年出不出去旅游度假,吃不吃肉,吃炒肉丝还是吃红烧肉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国民幸福指数,以此为前提调整经济措施,然后再回到种种经济数据上来,才能够找到与民众的共同语言,实现讨论的实际意义。

(据羊城晚报)

从跪着坐着站着的秦桧雕像说起

□ 韩轶超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秦桧在家乡南京江宁有了博物馆,其中还有一尊坐着的雕像,一时间引来网友无数质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日前在江宁实地调查发现,所谓“秦桧博物馆”并不存在,但坐像秦桧确实有。博物馆方面称,并未对用坐像还是跪像考虑太多,也毫无为秦桧平反之意。

历史上的秦桧,陷害忠良,卖国求荣,本是公认的奸佞之臣,在岳飞庙跪了几百年,被人鄙夷唾弃。而如今却由跪转坐,难道地位待遇果真就提高了一截儿?此前,上海艺术家金锋塑造了秦桧夫妇的雕塑坐像,并为作品起名《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歇歇》曾引来一片议论。

当下,以雕像形式示人的秦桧,或跪或坐或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姿态的问题,更多地代表着公众对于善恶忠奸的基本评判,关乎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尺与杠杆动摇与否。

如果说一尊雕像纯粹为了个人表达,雕成之后置于相对私人的空间,或者仅仅在小范围内作为艺术探讨之用,自然无可厚非。若把他们立于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供所有人观瞻,有时则难免引来一些超出单纯艺术价值之外的讨论。当民众的价值期待与雕像细节所反映出的价值存在分歧和偏差时,就会出现人们口诛笔伐、群起攻之的尴尬结局,甚至引发伦理和价值取向的质疑。

如今,小到城市街头一角,大到广场展厅,雕像作为一种典型的视觉艺术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地遍布于周遭生活。就文艺创作本身来讲,应鼓励其多元化创新,然而一旦牵涉到民族情感、价值理念等公共问题时,则要慎重思量其创新尺度了。

(据工人日报)

物美超市的老鼠,咬疼了食品安全的神经

□ 赵勇

近日,网上一则“北苑物美超市货柜发现老鼠”的帖子引发关注。网友王先生称,12月7日晚,他去该店购物时,看到装火锅调料冰柜里有一只活老鼠,店员将老鼠拽出处理。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表示,门店每月会请消杀公司做两次虫鼠类消杀,该店11月29日已做消杀,会尽快调查此事。

无论结果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这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鼠,又一次咬破了食品安全的外衣。这只老鼠首先咬破了罩在超市食品安全责任上的面纱。当记者前去采访时,看到“冰柜的顶部是一根巨大的空调管道,管道老化破损比较严重,多处贴着胶条。”抬头可见的安全漏洞,超市管理人员难道看不到吗?

它还咬出了食品安全监管缺失的事实。就连超市里的员工都不敢确定,老鼠是否会从管道缝隙里钻进冰柜的安全漏洞,卫生监管人员在检查中看不到吗?还是根本没有检查?

从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到“三聚氰胺”奶粉,再到“苏丹红”、“瘦肉精”的曝光以及“性早熟”的圣元奶粉风波等等,一连串的食品安全事故,一次次以触目惊心的方式曝光在人们面前。它们犹如一条拉链,无情地拉开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帷幕,让我们对其背后的“阴暗勾当”一览无余。

反思过去,我们赫然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并未杜绝食品安全隐患,现有针对性政策法规的缺失和监管机制的不完善,也并未因食品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据说一个中国人死了,倒在地上,拍扁了就是一张元素周期表”。这句赤裸裸的黑色幽默,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食品中添加剂和有毒金属太多”的事实。在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面前,貌似夸张的调侃,透露出的是民众的无奈。

没有哪个部门能够明确说明,我们每天吃进去多少有害的食品,哪些是高毒的。如同保罗·罗伯茨在《食品恐慌》一书中所写的:我们不知道还吃进什么的时候,对食品的恐慌就会“莫名其妙”地袭来。

物美超市里“出现”的这只小小的老鼠,又一次咬出了食品企业道德缺失,监管部门制约乏力的丑陋面目。它也敲响了一个警钟,敲给企业,敲给监管者,敲给无法知道真相的消费者。(据红网)

豆腐渣工程为何那么多都是“回扣”惹的祸

□ 惠砾生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对记者表示,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由于作案手段日趋隐蔽,举报概率过低导致受贿多查处少,加之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使得腐败分子“安全系数”高。

笔者曾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工作多年,对工程建设诸多“黑幕”略知一二。工程款是经过科学预算的,包含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等,这几年因市场竞争激烈,压价压价现象比较严重,工程款利润微薄,即便把全部工程款用于工程建设,利润一般在10%以下,甚至仅有2%左右。假如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施工方弥补并赢利的途径只能是大量偷工减料,或购置劣质材料以次充好,抑或是拖欠人工费。

“豆腐渣”工程为何那么多?质量安全为何频发?农民工欠薪现象为何铺天盖地……“三分之一工程款用于行贿”这个现实告诉我们:都是工程“回扣”惹的祸。

既然行贿才能承揽工程成“潜规则”,那还会有多少工程的发包能经得起“糖衣炮弹”而独善

新闻圈点

其身?恐怕无人敢于回答。最近深圳6座天桥维修工程被曝有质量问题,就有知情人回应:该工程预算160万元,层层转包后,到施工方手里不过25万元。160万元比25万,“回扣”占到近9成。

事实上,对工程领域的反腐,还不足以完全窥见工程款“回扣”的重重内幕。一些建设单位的工程发包腐败手段,一般是在工程发包中,个别掌权者直接接受或索要“回扣”;或是“肢解工程”,将工程化整为零,或分段上报,目的就是逃避公开招标程序,直接发包;或是满足不同的行贿者,从他们身上——捞取“回扣”。除此之外,资质借用和工程层层分包的泛滥,则是层层切割瓜分工程款的主要路径。在这种“潜规则”下,像吉林那段投资23亿元的铁路工程沦为“骗子承包、厨子施工”,像一些重点桥梁工程、工程设施建设,最终由几支农民工队伍担纲主力军,都不足为奇。



“工程上马,干部下马”,工程建设领域为何容易“前腐后继”,有专家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不规范、监管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所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多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比如《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也完善了各种制度,比如全国各地都建立起规范的有形交易市场,对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实行招标投标等。规范工程承包,杜绝腐败,其实目前并不缺法律,不缺制度,也不缺监管部门,假如都能严格依法行政,恐怕没有多少漏洞可钻。

在利益的驱使下,油气弥漫的工程市场不会“自净”,只能依仗执法部门的严格依法监管予以“澄清”。(据新华每日电讯)

女博士辞职,剩女焦虑症还是契约游戏?

□ 姜泓冰

安徽财大一位女讲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愿再回母校工作,要求辞职而不得,以留在蚌埠找不到爱情为由状告学校,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世上辞职、违约的事情千万件,如果没有“女博士”这顶帽子,没有“女博士的爱情”这么煽情的字眼,恐怕起这官司,充其量也只能在普法宣传里充当一个小案例,完全不可能变成东南地区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舆论纷纷评点的热门新闻——争辩、争议的底下,大多数人有着一种八卦、窥视表情。男人、女人、女博士,将女博士封为“第三种人”,用猎奇、嘲笑的心态围观这一群人,其实暴露的恰是许多国人的狭隘和肤浅。

女博士辞职,打官司都不稀奇,但“女博士因为在小城找不到爱情”而状告母校,这样的理由的确罕见。女性敢于坦率大方地将“找不到爱情”作为诉讼理由提出来,且也被法官认为是合乎人情常理,就现代妇女解放运动而言,该算一种进步。然而,将其归入整个社会越来越敏感和强烈的“剩女焦虑症”现象,恐怕更为合适。如果安徽女博士所说的理由和她对待母校的感情不假,那么仅仅因为可能找不到爱情,就宁肯背弃与学校的协议、改变职业发展轨迹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如今在一些年轻知识女性中,女性在职业与

伤不起的学校 伤不起的孩子

□ Y Y

南京市六合区大圣小学学生家长向记者反映,孩子们中午在学校吃饭,这个小学除了一年级的孩子外,二至六年级的孩子们,午饭结束后都会被学校安排轮流值日洗碗。一些家长表示,孩子还太小了,要在学校参加这么重的劳动,不可思议。洗那么多的碗后,袖子都弄湿掉了,孩子们受凉感冒了怎么办。

小学生的袖子怕湿,戴个袖套之类不就可以解决了么?家长不用那么紧张。

现在的孩子很娇贵,在校园里不能弄破点皮,不能受点“委屈”,连洗碗都被认为是“重劳动”,在

家长不动就投诉的压力下,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越来越谨慎,体育课连双杠都不用,连走路都要限速。新闻说,面对投诉,校长缄默;算了,还是咱们老师自己来洗吧。又一次退缩了。

伤不起,学校何苦吃力不讨好呢?但在这种家长过度关心之下,孩子的运动兴趣、劳动乐趣也日渐消失,我们能指望校园有多少生机呢?

(据羊城晚报)

(据工人日报)

(据工人日报)



(据工人日报)